

Financing life

财富是如何从农村源源不断流向城市的

◎杨斌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三农”问题列为治国安邦的重中之重加以处理,抓住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又做出许多减轻农民负担、化解“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深得民心。中央最近又提出进一步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其方向是取消针对的各种特别税费,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制度。这已经深入到了问题本质。本人经过长期的理论分析和实际调查,感到要进一步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首先必须分析农民负担的全貌,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农民负担达七重之多。农民负担不仅仅只是纳入农村税费改革视野的农业税、农林特产税、三提五统、税外税费和摊派(可称之为“老三重负担”),有的专家估计这些负担全国每年约1800亿,农民负担的主要部分是目前尚不为多数人所认识的间接税费负担(每年近5000亿)和“暗税”负担(本文称之为“新四重”负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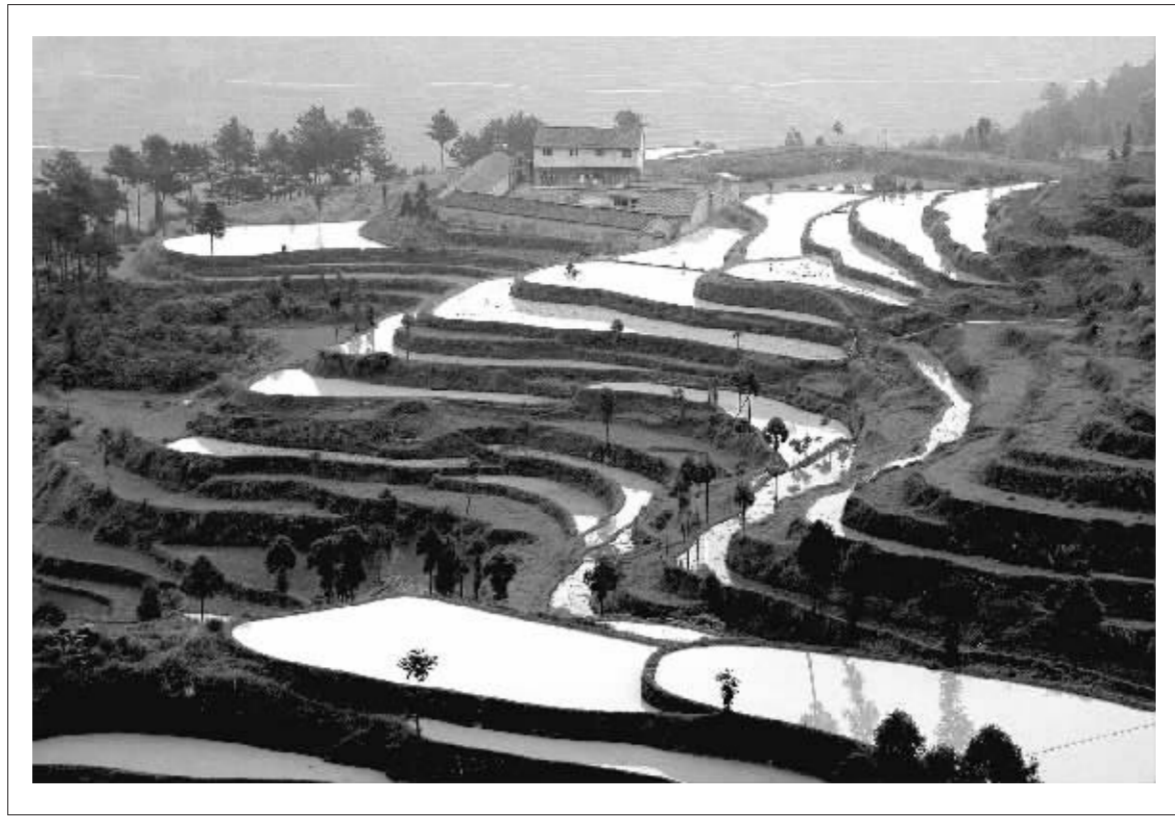
“新四重”负担的第一重是间接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等)。与西方国家的税制不同,我国实行的是以间接税(又称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间接税存在两个显著的特征:其一,间接税税价含中,人们在购买商品或消费服务时不知不觉已经将税收缴纳了,比如农民花了100元购买工业日用品,实际上已经缴纳了17元的增值税。间接税虽然透明度低,但属于“拔鹅毛而鹅不会叫”的征收方式,纳税人抵触小、征收容易,适合我国国情;其二,间接税是可转嫁税,纳税人不等于负税人。流转税形式上看,主要是由城市工商企业缴纳,但实际上承担税收负担的不是企业而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消费者,他们在购买商品或进行消费时,将含在价格中的税收一起支付了。并且我国间接税(流转税)实行生产地课税制度,纳税人以城市工商企业为主,工商业越发达地区其税源也越丰富,获得的流转税也越多,这样工商业集中的大城市获得的流转税就占最大的比例,通过分税制分得较大的份额,并作为城市公共产品的财力来源。中央政府、省特别是大中城市政府获得的流转税收入,并不是全部由城市消费者支付的,很大一部分是由农民消费者支付的。对城市居民而言,他们负担的流转税,通过获得政府提供的各种服务(包括义务教育、城市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等)而得到补偿。但农民负担的流转税却主要转到了城市,他们居住在城市并不享有这部分由其辖区内农民负担的流转税,从而也就不可能将其作为公共产品的财力来源。这就形成集中纳税和分散负担的非对称性。财富由农村,由县乡源源不断地流向大中城市。根据《中国

统计年鉴》提供的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抽样调查数据,可以推算出2002年农民总消费占全部消费额的比例为32.02%,由此进一步推算出农民作为消费者当年负担的流转税为3964.59亿元。这笔税收主要集中到中央和大中城市,农民所在地乡村政府并不能使用它们。

“新四重”负担的第二重是农民承担的增值税“进项税额”。由于农民不作为增值税的纳税人,无权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将进项税额转由农产品采购商或消费者负担,而自己要负担进项税额。欧盟也对农民免征增值税,但对农民均采用“统一税率补偿”的办法将进项税额还给农民。我国没有此项规定,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农村居民人均生产经营支出的抽样调查数据,可推算由于对农民免征增值税而导致其负担购买农业投入品的进项税额2002年达到831.04亿元,这笔税收同样主要集中到中央和大中城市,农民所在地乡村政府并不能使用它们。



综上所述,农民实际负担的间接税近5000亿元。就农民而言,本来通过流转税负担了税收,应该与城市居民一样获得公共产品,乡村政府的运行费用、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基本的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应当由这笔税收支付。但实际上农民负担的这些税收却到了城市手中,或一部分通过分税制上交中央,而中央主要的投资方向是城市,这样农民就得另外支付农业税、农林特产税、“三提五统”、税外收费和各种摊派来维持乡村政府、义务教育等必需的公共产品。这是目前城市特别是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财政宽裕,而多数县乡财政吃紧、对农



民税外收费难以禁止的根本原因。我国农民人均税费高于城镇居民人均税费,但所获得的公共产品不仅微乎其微,而且在获得某些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的多数公共服务(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公用电信服务、电力供应、燃料供应、清洁水供应和治安管理服务等)时要支付远远高于城市的价格。即使他们进入城市务工,与城市居民同样缴纳税费(甚至比之更重),但由于身份的缘故,他们不能在城市社会中获得平等的地位和相同的机会,他们付出同样劳动不能得到同样报酬,他们不能享有社会保障,他们的子女不能拥有同等的教育机

会,他们在城市建设和文明进步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不能共享文明的成果。农民负担重得益少,存在典型的非对称财政机制。不考虑上述这种财富流动的本质,只在直接税费范围内转变形式,当然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如果说间接税属于法律规定的“明税”,农民不仅负担了这些“明税”的相当一部分,并且得不到补偿。而且还要承担传统的“暗税”和现代“暗税”。传统“暗税”,即“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据有的学者估计改革后通过传统“暗税”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向城市工商部门的资金高达811亿元。这是农民“新四重”负担的第三重。

“新四重”负担的第四重是现代“暗税”,以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土地等资源被征用而补偿不足、丧失和社会保障而造成的财富转移。1987-2001年期间,平均每年被征用的耕地为214万亩,按每亩补偿不足的差额8万元(按福建省会近郊中等耕地耕种中等价位经济作物经营期30年纯收入折现值减去法定补偿金额推算)计算,每年平均通过耕地征用补偿不足向农民索取的“暗税”至少1712亿元。如果土地按市场价值计算,这一数额要几倍甚至几十倍于此。

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人们之所以负担税费,是为了获得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包括政府服务、义务教育、基础交通、社会保障等等)。暂且不考虑“暗税”,如果能够让农民负担间接税(每年近5000亿元)以提供能让农民受益的公共产品方式整体地返还给农民,即用这笔税

收支付县乡村政府费用、义务教育费用等必需的公共产品开支(按目前的水平计算全国约3700亿元),他们并不需要缴纳农业税、农林特产税、三提五统、税外税费和摊派,而且他们还能从各级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中获得等量或等价的利益,这些利益会使他们的生产条件不断改善,生活环境持续优化。农民整体负担沉重问题就不会出现。正是由于农民不能通过公共产品的方式获得其负担的绝大部分税费,财富主要通过间接税和“暗税”方式从农村净流出,才出现农民负担持续沉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不考虑这种财富流动的本质,在农村内部来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就是在“老三重”负担范围内做文章,将“三提五统”和其他税外税费并入农业税,同时提高农业税率。这样的改革与历代进行的并税式改革相比并没有多少创新和进步。这样的改革只是治标之策,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并不能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

要让农村税费改革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防止出现减轻农民负担和不降低(并且还要逐步提高)农村公共产品提供水平之间的矛盾,不仅要彻底取消对农民征收的农业税、农林特产税、“三提五统”和其他税外收费摊派,而且首先必须通过对农村地区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将农民负担的间接税“还给”农民,然后逐步解决加在农民身上的“暗税”负担,这比奢谈什么“工业反哺农业”和农业保护、农业补贴要实在得多。

■财富漫谈

大哥“带头”之后咱该做什么?

◎张晓晖

“带头大哥”让公安部门拿了。据说其博客点击率已经超过了某女明星——很纳闷,连他的长相都没见过,人气居然超过了倾城倾国。“带头大哥”是一定要办的,据说是为散户服务,实际上行敛财之事。敛财还在其次,他居然成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精神支柱,要带领中小投资者赚钱,这就有点天方夜谭了。不是说中小投资者赚不了钱,而是说带领这个群体赚钱是不可能的,一赚二平七个赔,这是铁律,谁也逃不掉。中小投资者完全可以赚钱,但前提是,摆脱群体思维,学会独立思考,独立操作。

不管怎么说,“带头大哥”还是有价值的,那就是他给咱带来了许多思考。

首先,为什么“带头大哥”能成为领袖性人物呢?

鄙人也想当个领袖,比如鄙人想弄个保险公司,专门为广大人民服务,只要您交了保费,无论什么责任,我一律赔偿,如何?或者鄙人弄个车,保佑大家身体健康,只要能交上香火钱,各种疑难杂症,手到病除,手不到病也除,如何?

做得到的?做不到。如果我弄个保险公司,会耽误千千万万保险营销人员的生意,穿梭在大街小巷的他们会异口同声地告诉客户,这家伙是个骗子;如果我弄个庙,会影响很多医院、卫生院、社区医院、私人门诊的生意,他们会告诉患者,这家伙是个骗子。

看来,“带头大哥”能蛊惑人心,还是因为我们的建设里少了点啥。如果遍地有合法身份的经纪人去提醒他们身边的客户,“带头大哥”还能呼风唤雨么?如果不及时拿了,说不定哪天他能搞出个邪教也未可知,那才会闹出大麻烦来。

也许,有人担心经纪人里面有骗子,但事实上,经纪人很难行骗,因为他们与客户面对面地接触,没有神秘感;倒是未曾谋面的“带头大哥”,其神秘的经历、煽动的语言、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感觉忽悠了很多人。退一万步说,即使经纪人都是骗子,一群小骗子总比一个大骗子的危害小吧?两害相权取其轻嘛。

说到底,我们的草根建设不足,所以网上一出个“神人”,马上引人注目,好像芝麻地里窜出一根高粱来。而有些人不愿意自己拿主意,不愿意独立思考,更不愿意独立承担责任,所以就拿土地爷当真神,顶礼膜拜起来。

要是到处是小土地庙,估计也就没这事儿了。其次,崇拜“带头大哥”的中小投资者自己也该反思一下,是什么让自己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

想起“文革”,史笔总结,不外乎伟大领袖有失误,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但那个时代的每个人都应该反思一下,自己是否足够理性、足够善良?

也许最初是出于革命的信仰,但是打人、揪斗、抄家、给人家剃阴阳头是什么呢?把老人打得满头是血,给妇女脖子上挂破鞋,极尽殴打羞辱之能事,又是什么呢?也是革命么?就这样为非作歹很长时间,难道自己就没有怀疑过这“革命”么?难道自己的良心就没有动一下?是什么让自己违背了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几千年植根于心灵的道德传统呢?

大概是在种种恶行中,体会到了一种快感,破坏的快感,颐指气使的快感,所以要去不断地体会这种快感吧?在革命的名义去释放自己内心中的“恶”的一面吧?

事后纯粹地把这些恶行都归咎于别人,而把自己说成是受蒙蔽、是受害者,未免言不由衷。想起巴金的《随想录》,老人把自己的错误完全完全地写出来,不容易。

尘埃落定之后,人民不需要反思么?同样,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哪天“带头大哥”马失前蹄或者故设陷阱,把跟随者套牢了,会发生什么事呢?

一定会网上通缉,咬牙切齿地要“灭了他”;一定会控告相关媒体,为什么他们对“带头大哥”炒作,推波助澜?

一定会控告“带头大哥”,因为他们赔了钱,而忘了“带头大哥”曾带他们赚了钱。对于赚钱一折,本人深信不疑,因为过去一年的行情,想赔钱只怕都困难;

一定会指责有关部门,为什么对“带头大哥”视而不见,姑息纵容?

好了,如果是这样,该赔钱的以后还要接着赔钱,因为他们把自己的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忘了“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忘了“愿赌服输”这一起码的游戏规则。

群体性迷惘必然导致群体性追随,群体性追随再带来群体性暴力,然后是群体性伤害,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

想起追随希特勒的青年们,相信他们曾经善良正直单纯,但他们组成的盖世太保、党卫队,犯下了奥斯威辛等一系列的暴行;

想起了法国大革命,《自由引导人民前进》这幅油画固然描绘了攻克巴士底狱的壮观场面,但随后是阴森恐怖的断头台、盛满头颅的箩筐、嗜血而暴力的民众;

还想起了南北战争,北军统帅格兰特将军接受了南军李将军的投降,南军士兵可以带走他们的马,以后种庄稼用得着;军官可以带走手枪和剑,让他们体面地离开;胜利者不倨傲,失败者不耻辱,宽容带来了民族的和解与团结,人民的尊严与福祉。

回眸看去,可以想的事情很多,如何在投资者教育中纳入理性、宽容、责任等内容,似乎应该是予以重视的。媒体如何冷静、客观,不要像狗仔队那样追腥逐臭,也是值得重视的。

有一种爱是装作不心疼

◎陈大超

股票疯涨的时候,三弟打电话来说:“你拿出二万来炒,到年底至少能赚三万。”我没动心。二弟打电话来说:“我拿了六万去炒,一个月就赚了四万。”我仍然不为所动。我这个人有点“迷信”:越是好赚的钱,越不是我能赚来的。妻子却说:“你不赚,我去赚行么?”经不住大家一劝再劝,我终于说:“行。”于是从我多年存下的稿费里,取了二万给她。

妻子排了好几天的队,才入上户。没几天时间,账上就多了将近两千元。“这不比你辛辛苦苦写作强多了?”她满脸喜色地说。她说只要赚上钱,我可以少写点,“干吗不过得轻松悠悠些呢?”她说。

接着就是印花税,就是止不住地狂跌。“赚来的那两千元,转眼之间就没有了。”

“今天又是跌,我们的本钱开始亏了。”

“今天又是跌,我们的本钱已经亏掉四五千了。”

妻子下班回来,第一句话就是报告股市行情。我总说:“不去管它,既然入了股市,不论涨和跌,都要保持良好的心态。”有时则说:“不要紧,过些时一涨,那些亏去的本立刻就会回来的。”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但是时间过去了一天又一天,不仅亏去的本没有回来,反而有更多的本又亏了进去。“已经亏去七八千了。”有妻子回来,悻悻地说。我立刻说:“没事没事,人家比我们亏得更多呢,我今天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一个人抽香烟的功夫,就亏去了十万。”

妻子从此爱上了看电视上的股评,看报纸上的股评,还找那些会炒股的同事取经,还戴着老花眼镜,很认真地在那些笔记、中午也不睡午觉了,说就是一片至三点那段时间要紧,“只要抓住了机会,我就卖出去,这样就能减轻一些损失,说不定,有时候还能一下子赚几百块钱回来。”她这样说。但那样的机会总没出现。

“我发现股票跌起来,一下子能跌好多,但往上涨呢,总是几分钱几分钱地涨,而且还涨到你出手的地步,它又跌下去了。”她戚戚然道。我就说:“现在这样的股市,你没有必要天天去看了,只当没有这回事的,让它放在那里吧。”

股票继续在跌,两万元,跌得只剩一万了。发表多少文章才能赚回这么多的钱?这些文章又得多少时间才能写出来?但是这个账,我只在我的心里算一算,当着她的面,我的脸上不知多么的风平浪静。钱损失就损失了,如果弄得家庭不和,损害了身体健康,那就真的是太不划算了。有时候真正能够减轻的损失,就是不让家庭的和睦与健康搭进去。

昨天妻子回来时,“告诉你,你可得有心理准备,我们的本钱已经跌不到八千了。”我只是望着她笑笑,又埋头写自己的文章了。“噢,我发现你对我们的钱一点都不心疼呢。”她睁着一双疑惑的眼睛,久久地盯着我。我只好再笑笑,说:“没事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涨起来的,我们需要的,只是沉得住气。”

我没有说出口的是:有一种爱,是损失再多的钱,都要装作不心疼。

你的福气到了

◎文/贺清华 图/许青天

那天,我正在办公室写材料,走进一个身穿僧袍的胖和尚。他径直走到我身边,说:“阿弥陀佛!这位同志,你的福气到了。”

说着,递过来一个印着弥勒佛像的小卡片。我知道准是要钱来了,没吭声。

胖和尚继续说:“看你这位同志,两眼有神,印堂发亮,是个做官的料呀!”

接着,他凑过脑袋耳语道:“你真的是福气到了。我不轻易给人送卡片的,我是看你福气到了才送你一张。你看,你看——”

说着,胖和尚打开手上一本本子,放到我眼皮底下,只见上面赫然写着我们局长的大名和工作单位。

胖和尚小声说:“我只给你和你局长送了卡片,你们局就你和局长福气大。签个名吧!”

我心里不由动了一动,心想反正是签个名,能和局长的名字并排签在一起,也是份荣幸。于是接过笔,唰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和单位。

“好,好。”胖和尚收回本子,又递过来一个“功德簿”,上面再次写着局长的名字和捐款100元。

我不屑道:“我可没钱。”

“千万别这么说。”胖和尚说:“捐多捐少是你的意思。你们局长捐了100元,你可别落后。你的福气以后绝对要超过你们局长……”

我的心又动了,局长都捐了100元,我又何必在乎这区区几十元钱?这么一想,我唰唰又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和20元钱。然后,边掏钱边说:“局长捐了100元,我就捐20元吧!”

“随意,随意!”胖和尚接过钱,又道一声“阿弥陀佛”,走了。

快下班的时候,同事老王走了进来,说:“你小子给那个和尚捐了200元钱,害得我捐了50元。”

我一愣,说:“没有呀!我就捐了20元钱。”

“什么没有?”老王不满地说道,“那和尚的功德簿写得清清楚楚,局长捐了100元,你捐了200元。你比局长还多捐了100元。我只好捐了50元……”

我分辨道:“局长是捐了100元,可我是20元。我什么时候捐了200元?”

正说着,局长走了进来,说:“我什么时候捐了100元?我就给了他1元钱……”

